



# 情绪在决策范式中的角色分析及运行机制

吴瑶瑶

**摘要:** 决策论的研究都采用“理性人”假设作为前提,以理性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这种强调理性决策,忽视情绪的决策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和指导实际的决策过程。行为决策的三种研究范式中,标准化决策范式否认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认为可测量的“偏好”能帮人们作出“效用”极大化的选择;描述性决策范式开始关注到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提出的后悔理论、失望理论以及主观预期愉悦理论详细描述了决策过程中的认知、思维及其心理过程的作用;进化论决策范式从生态理性出发,认为情绪、经验以及内隐认知在人类决策行为中起着极重要作用。情绪在决策过程中的运行机制有两种主流看法:一种认为情绪是作为决策过程的一种驱动机制;一种认为情绪是作为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机制而作用于决策过程。这两种机制对于决策过程都是重要的,但不足以充分说明情绪作用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和互动性。情绪作为一种功能状态,在与大脑、身体和环境的共同作用中,帮助我们综合运用认知、理性思维和情绪能力,通过生成性机制作用于决策过程。

**关键词:** 决策论;情绪;理性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4.0205

**收稿日期:** 2023-06-29

**作者简介:** 吴瑶瑶,女,河南郑州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素质教育中心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情绪哲学, E-mail: yaoyaowu511@outlook.com。

传统决策理论普遍认为情绪是非理性的,主要表现在情绪的认知评估不可能,语言描述不可及,或者是个体自主不可控。这种观点否认了情绪作为一种功能的合理性。然而,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质疑出现,感性与理性截然二分的观点受到挑战,同时,情绪的合理性也受到日益关注。著名哲学家德索萨提出了关于情绪具有理性和客观性的论证<sup>①</sup>,现代情绪哲学家所罗门也认为“情绪是有意向性的。也就是说,情绪是关于某物的”<sup>②</sup>,情绪是“关于”外在世界的,并非纯粹发生在内在的一种主观状态,而是一种功能状态,并且与我们的决策行为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在三种经典的决策范式中,情绪都隐性或显性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在决策过程中有自身发挥作用的运行机制。

## 一 决策行为中的“理性人”假定与其缺陷

决策(decision making),是指评估和选择已有选项的过程,即作出选择或决定。人类生活的各种事务,从个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到国家的权力运行,都需要人们作出判断和决定。随着对这种行为的深入研究,涌现了多门决策学科,如运筹学、博弈论、决策论等。这些学科都属于应用数学,既有重叠交叉,又各有侧重。运筹学侧重总体布局、战略规划和相关的数学难题;决策论主要注重研究单个决策者或决策机构的各个可行行动方案产生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从而得出每种行动方案的期望效用。博弈论的重点是多人对弈型

<sup>①</sup>Ronald de Sousa, *The Rationality of Emo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1, 4-5.

<sup>②</sup>Robert C. Solomon, “Emotion and Choice,” in *What Is an Emotion?*, ed. Robert C. Solom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25.

情境下的决策算法。在这样的博弈情境中,两个或多个决策者独立作出决策,但他们的行动选择的结果都受到对方决策的影响。

尽管以上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并且适用范围广泛且具有显著效果,然而去繁就简,决策问题依然是这些理论的基本问题。就决策论而言,其理论也在不断发展。然而决策理论一直以理性主义为其理论基础,致力于制定理性的选择标准。早期标准化决策理论是以贝叶斯主义(Bayesian doctrine)为理论基础的,在这一决策理论中的决策者是“绝对理性人”,“绝对理性人”对于决策结果是全知的,可以预知所有选项所对应的潜在结果;“绝对理性人”是全能的,可以预知所有选项对应的偏好情况(效用)。基于这一假设,决策过程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计算或推理过程,决策者知道所有的可选选项,并根据效用推算出每个选项的预期结果即效用值,然后选择效用最大化的结果。然而,执行这种决策过程的“绝对理性人”所具有的全知全能,在现实决策中难以达到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在人类实践和实际生活中效用最大化也并非一定是决策者所要求的结果。因此,“绝对理性人”的假设使得基于建构数学模型进行理性决策的标准决策理论变为空洞的理论。

西蒙(Herbert Simon)首次提出了“有限理性”这一概念,他指出,人虽然是有理性的,但其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为指导现实中人们的决策行为,就需要使用一种符合实际情况的理性行为,而不是经济学中所假定的全知全能的理性行为,他进一步指出:“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sup>①</sup>西蒙放弃“绝对理性人”的假设,提出“有限理性人”的概念,使用更适合指导现实决策的“满意度”原则来替代“绝对理性”原则。“有限理性人”强调现实中的决策者不可能获得关于可选策略和世界状态的完备信息,但在现有的信息条件下,决策仍然是一个纯粹的计算过程。在博弈论中也存在着“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即每个博弈参与者都被假定对所处环境及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形成合乎理性(或者说正确)的理念与预期,同时,各决策主体以最大化自己利益为目标作出完全理性的选择。经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也源自理性主义,认为如果人们能够熟悉所有相关信息,那么他们就可以确定并作出对他们最有利的选择<sup>②</sup>。在相关学科中对决策者和决策过程作出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的假定,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因为这是对决策问题进行量化描述和模型化的前提之一。

在决策逻辑上,决策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构成部分,即推理计算(理性)和自由选择(行动)。一般来说,人们认为推理计算在逻辑和时间上先于自由选择,自由选择伴随推理计算而来。换句话说,基于“理性人”假定的决策理论认为,决策发生在推理计算的结果之后,或者说决策发生在权衡利弊之后,并且理性过程之后必然能够产生决策。在传统理性主义看来,决策就是一个“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sup>③</sup>的过程。决策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人有理性能力和自由选择能力,并且能够促成实际行为的发生。

然而,将决策者视为“理性人”,把决策过程完全视为推理和计算的理性活动,会引发一些问题:第一,决策过程仅仅包含理性认知的因素吗?情绪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发挥作用?第二,如果决策过程中也涉及情绪因素,那么理性和情绪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仅凭理性认知就一定能够导致实际行动吗?知道如何做和决定如何做乃至实际如何做是一致和统一的吗?第三,情绪是如何影响决策过程的运行机制的?本文将通过分析情绪在决策范式中的角色及运行机制来探究这些问题。

## 二 情绪在三种决策范式中的角色分析

研究行为决策的范式主要包括标准化决策理论、描述性决策理论和进化论决策理论<sup>④</sup>。标准化研究范式的代表性理论有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的最大期望效用理论和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描述性研究范式和进化论研究范式则主要在心理学领域展开。描述性研究范式主要代表理论有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的前景理论,卢姆斯(Graham Loomes)等的后悔理论、失望理论;而进化论研究范式则是从进化的角度看到环境结构对决策的影响,基于

<sup>①</sup>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韩春立、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sup>②</sup>Christopher K. Hsee, Reid Hastie, “Decision and Experience: Why Don't We Choose What Makes Us Happ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0, no. 1 (January 2006): 31.

<sup>③</sup>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2页。

<sup>④</sup>庄锦英《情绪影响决策内隐认知机制的实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2—33页。

对理性概念的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对决策行为进行描述性研究。下面笔者将对不同研究范式中情绪的作用进行分析。

### (一)标准化决策范式中的情绪

标准决策模型是冯·诺伊曼、萨维奇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方式创建的。萨维奇的两个核心概念是结果和状态,即行动可能产生的结果和可能的世界状态,这两个概念对应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意图(目标、愿望)和信念(关于世界状态的信念)。可能结果用效用值表示,而世界状态则用事件的概率来表示。因此,一个行动方案在不同的世界状态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各种可能结果与相应的世界状态的概率相乘,所得的数值即是该行动方案的期望效用。期望效用最大的行动方案是决策者的合理选择<sup>①</sup>。这种合理性选择受到严格的数学规则的制约,因此,标准决策论也是规范决策论。

可以看出,标准化决策范式是在理性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以数学计算进行理性的决策。在标准化决策范式中,完全否认情绪的作用。然而,在实际计算中的困难在于,标准化决策范式是基于“效用”这个核心概念建构起来的。决策目标就是“效用”最大化。效用概念最早由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提出,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发展了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个人的选择不依赖于获取利益大小本身,而是依赖于获益后的心理满足或者愉悦程度,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或者愉悦就被称为效用<sup>②</sup>。因此,效用不只是行为的物理结果,它还包含着决策者对于物理结果的情绪态度。但标准化决策范式坚决否认情绪在其中的作用,将决策主体对可能结果的情绪态度、主观评价定义为“偏好”,虽然决策结果受决策者个人偏好的引导,但是每个“理性人”都具有稳定的“偏好”,因此效用根据每个人被预定的固定的“偏好”来评估,决策过程不会再受情绪的影响,就成为排除了情感因素的可测量的客观指标。

标准化决策范式试图将“情绪”转化为固定、客观的“偏好”,从而维护理论的内在一致性,然而在实际应用中,该范式却无法合理解释现实中很多的决策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偏好反转”现象(Preference Reversal Phenomenon)。“偏好反转”指的是人们在面对期望值相似的赌局时,往往会选择概率高但期望值小的赌局,而对概率低而期望值大的赌局定价更高<sup>③</sup>。根据标准化决策研究的观点,决策者被视为理性人,其个人偏好是确定不变的。从理论上说,人们在作出选择时,应该对所作出的选择定价较高,然而,在实际选择中,人们却表现出了偏好的反转。因此,“偏好”指的是决策者对于风险的态度,或者说是决策者的特定需求和欲望,是通过情绪表现出来的。所以,标准化决策范式中核心的“效用”、“偏好”都与情绪密切相关,否定了情绪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否定掉了该决策范式理论的应用性,使之变成了空洞的理论。

### (二)描述性决策范式中的情绪

描述性决策范式详细描述了决策过程中的认知、思维及其心理过程的作用。其中著名的有前景理论<sup>④</sup>、后悔理论<sup>⑤</sup>、失望理论<sup>⑥</sup>以及主观预期愉悦理论<sup>⑦</sup>。从这些理论的名称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情绪因素。描述性决策范式在解决标准化决策范式“偏好反转”的困难方面,强调情绪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使决策理论更好地解释现实决策过程。

前景理论提出,效用受决策现状和未来效益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在面对小风险条件时。在此情况下,值函数曲线在赢区呈凹型,在输区呈凸型。即人们在获益领域表现出“风险规避”,在损失领域表现出“风险寻

① Leonard J. Savage,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2), 13-14.

② Daniel Bernoulli, "Exposition of a New Theory on the Measurement of Risk," *Econometrica* 22, no. 1 (January 1954): 24.

③ Sarah Lichtenstein, Paul Slovic, "Reversals of Preference between Bids and Choices in Gambling Decisions," *Research Bulletin* 10, no. 7 (October, 1970): 2-3.

④ Daniel Kahneman,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no. 2 (March 1979): 263.

⑤ Graham Looms, Robert Sugden, "Regret Theory: An Alternative of Rational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Economic Journal* 92, no. 368 (December 1982): 821-822.

⑥ David E. Bell, "Regret in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Operations Research* 30,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82): 961.

⑦ Barbara Mellers, Alan Schwartz, Ilana Ritov, "Emotion-Based Choi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8, no. 3 (1999): 342.

求”倾向<sup>①</sup>。前景理论中出现很多情绪词汇,如希望、恐惧、乐观和悲观等,同时也认为人们在决策中不仅受正面情绪引导,还受负面情绪影响。卢姆斯等学者认为预期情绪可以改变效用值,从而影响决策,进而提出后悔理论。他们假设,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对于结果的预期,也就是效用的预期值,会影响决策结果。由于现实中的决策者不是全智全能的,无法精确计算出每个结果的效用值。但是决策者会对选项的效用值有一个预期,例如,如果预期自己的选择结果可能不如另外一种选择时,就会产生后悔情绪;反之,会产生愉悦情绪。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后悔理论。几年后,卢姆斯、萨格登(Robert Sugden)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失望理论。当决策者面对同一选项对应的不同结果时,如果预期自己选择的结果是几个结果中较差的一个,就会体验到失望情绪。与后悔理论一样,预期到的失望情绪通过改变效用值影响决策。后悔理论和失望理论都是基于对预期情绪的比较来影响决策的,选择可能引发正面情绪的选项,避免负面情绪。后悔理论强调了不同选项引起的预期情绪之间的比较,失望理论强调同一选项可能引发不同预期情绪的比较。米勒斯(Barbara Mellers)等学者提出主观预期愉悦理论。米勒斯认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追求情绪愉悦的最大化<sup>②</sup>。个体对决策结果的预期情绪受结果、比较和与结果相关的信息的影响。然而主观预期愉悦理论不再使用包含情绪因素的“效用”一词,而直接使用预期情绪讨论情绪对决策过程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微小但出人意料的收获所带来的愉悦大于巨大但意料之中的收获所带来的愉悦,更贴近现实的决策过程,增强了理论的预测功能和解释能力。

虽然描述性决策范式理论提及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但是对于情绪具体在决策过程中如何起作用,情绪作为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参数,起到多大作用,理论并没有详细的论述和研究。

### (三)进化论决策范式中的情绪

标准化决策范式否定情绪的作用,试图用数学推理和逻辑建立完全理性的决策范式,而描述性决策范式力图解决标准化决策范式的困难,用情绪来解释现实决策中违反理性决策的现象。但是本质上,他们都是在理性主义的范畴内思考决策范式。而进化论决策范式突破了传统理性范畴,不但从根本上更重视情绪对决策的作用,而且重塑了“理性”概念,提出生态理性,生态理性就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对理性作出的反思与重构。传统的理性观通常假定一个复杂的、不受内容限制的逻辑或概率推理工具,在人们头脑中能够实例化。生态理性则认为,理性源自人类祖先在自然环境中,反复面临信息处理问题时,所形成的一种简单自适应启发。传统理性观在框架问题上总是自上而下的,比如喜欢追溯无穷、极限等问题,生态理性观则是自下而上的。它首先识别和探索简单的启发式决策组件,然后用这些简单的成分组件构建更复杂的认知模块。生态理性强调环境信息,强调行为对环境的适应。

因此,从生态理性的角度来看,感官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处理方式对人类决策行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情绪在充分利用环境信息作出反应方面与生态理性的作用是一致的。它认为情绪是在进化适应中发展而来的,具体说,是为了适应生存和增加繁殖机会而设计的<sup>③</sup>,每种情绪都有专门的机制引起一系列协调的经验、初步的反应倾向、表达行为(面部表情)、自主神经和内分泌反应。进化论决策范式从人的生物学和生理学角度强调环境的作用,强调决策行为适应环境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情绪经过长期进化的考验,比逻辑与推理更为实用有效,有时甚至会以神经反射的形式,不经过人的意识层面,更为直接地影响人的决策行为。

总的来说,决策的进化论研究范式更加注重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情绪不再是包含在效用概念中的隐含因素,而是被明确地提出,并强调情绪对于决策的重要性。在现实情况下,情绪并不是决策的负面干扰,而是提高决策效率和准确性所必须的因素。

### 三 情绪在决策过程中的运行机制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在各种决策研究范式中,情绪都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它在决策过程中以不同的形

<sup>①</sup>Daniel Kahneman,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no. 2 (March 1979): 268.

<sup>②</sup>Barbara Mellers, Alan Schwartz, Ilana Ritov. "Emotion-based Choi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8, no. 3 (1999): 341.

<sup>③</sup>John Tooby, Leda Cosmides,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the Emoti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al Regulatory Variables," in *Handbook of Emotions*, ed. Michael Lewis, Jeannette M. Haviland-Jones, Lisa Feldman Barret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8), 115.

式反复出现。当前在关于情绪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中,也反复指出情绪是理性行为(比如决策行为)得以完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那么,情绪在决策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对此,主流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情绪是作为决策过程的驱动机制起作用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情绪是作为进化过程中的适应机制而对决策过程起作用的。这两种观点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情绪是作为决策过程的一种功能性生成机制。

### (一)情绪作为一种行为驱动机制作用于决策过程

标准决策理论中的“偏好反转”表明了注重逻辑的理性主义在否定情绪作用的情况下无法预测和计算出实际的决策过程,也就是说,理性推理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去做决策,却不能直接引发实际行动。情绪对行为的驱动作用在于决定如何做和实际如何做,它是最核心的动机。

理性可以思考和发现对象的因果关系,但无法直接促发人的行为。简而言之,理性只能进行逻辑和因果推理,仅在认识观念的关系和对事实的存在进行确证这两种认知范围内起作用,正如“绝对理性人”和标准决策范式理论一样,解决了知道如何做的问题,但与实际如何做相背离。在实际决策中,“理性的推理已被证明难以通过计算实现,因为,汇集一套解释数据的假说,其所需的时间,随着参与命题数量的增加而呈指数性增长,就此而言,没有一台电脑可以穷尽所有的搜索”<sup>①</sup>。要对每个选择在未来时间点的利弊得失进行详尽的分析,这将带来无穷尽的计算,从而使得决策时机延误。

休谟认为,“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sup>②</sup>,强调情绪对人的行为起着直接驱动作用。正如描述性决策范式所指出的,愉悦、恐惧、后悔、失望等情绪直接作用于决策过程,影响决策结果。当我们想到某个对象时,会体验到不同的情绪,比如痛苦或快乐,从而引发对该对象的厌恶或喜爱,基于这种情绪体验会促发我们回避或者接受的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对于对象没有任何的情绪感受,那么对象的逻辑推理和因果关系就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所以,只有当我们将对该对象产生兴趣和情感时,理性认知才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能够促进并指导我们的行为。因此,真正驱动行为的是认知者的情绪而非理性认知。而且理性也并不具备阻止某种所谓不合理行为的作用,情绪引发行为,阻止这种行为冲动的只能是另一种情绪。例如,当我们为做错了某件事而后悔时,驱动纠正行为的动机或许并不是对做错事的认知,而是对做错事的后悔。

许多决策形式,尤其是那些涉及高度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决策形式,都包含了偏见和情绪,这些偏见和情绪以隐性的方式起作用<sup>③</sup>。例如,不愉快的情绪与较低的信心、厌恶风险和警惕的决策形式有关;愉快的情绪与更高的自信、更乐观的期待和更多的合作有关;情感状态对决策和社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以亲社会的方式行事,但消极情绪状态对人的决策和行为的影响更为复杂<sup>④</sup>。此外,特定神经区域的损害可以从根本上使决策产生偏差<sup>⑤</sup>等。如果决策过程中没有情绪的参与,正如达马西奥(Antonio R. Damasio)所研究的额页皮层部分功能(主要是情绪功能)受损的病例,当这些病人面对可怕景象或美景时不会像普通人那样产生正常身体反应,他们虽然讲求逻辑、头脑清晰,却再也无法正常生活,甚至像“布里丹之驴”一样无法在日常生活中作出决策。按照休谟的思路,这些病患的麻烦在于他们内心丧失了喜恶之感,失去了驱动行动发生的力量之基。

情绪如何影响决策过程的运行机制的呢?传统决策论关于“绝对理性人”的假定,使得决策沦陷在认知推理过程中无法自拔,而恰恰是情绪可以及时终止这一过程。在面对众多的选择时,人们不可能像电脑一样计算出无穷无尽的可能结果并进行理性分析,而是会利用过往经历和情绪体验,通过记忆中情绪体验的好坏而形成个人偏好(也就是对可能结果的情绪反应),这种偏好能够帮助我们在没办法仔细考虑的情况下迅速

① 费多益《认知视野中的情感依赖与理性、推理》,《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第33页。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 L. A. SelbyK-Bigg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46), 415.

③ Nasir Naqvi, Baba Shiv, Antoine Bechara, “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sion Making: 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no. 5 (October 2006): 260.

④ Margaret S. Clark, Alice M. Isen,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ling States and Social Behavior,” *Cognitive Social Psychology*, ed. Albert H. Hastorf, Alice M. Isen (New York: Elsevier, 1982), 79-80.

⑤ 安东尼奥·R.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毛彩凤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作出反应,实施行动。在进行认知评估时,情绪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使某些选项突显出来,为人们的选择提供线索和依据,帮助人们作出决定并行动。因此情绪有助于解决特定的环境下需要注意哪些信息的问题,也就是说情绪为不同类型的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测试和搜索策略,避免思维迷失在潜在的无限信息而陷入分析的泥沼。在情绪的帮助和筛选下,推理过程才会开始计算每个操作的预期效用,并自动选择期望效用最高的那个操作。

情绪作为一种行为驱动机制作用于决策过程,更多的是从人的神经生物学角度,探究人的认知、身体应对外界环境的运行机制。

## (二)情绪作为进化过程中的适应机制而作用于决策过程

情绪对外界环境作出反应,并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然而,情绪也并非被动地反应,而是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和改变环境,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进化过程中的适应机制。在进化论决策范式中,它从生态理性的视角下看情绪,强调了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环境的适应,而情绪正是在这种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并且具有优化人们互动方式的进化价值,有利于我们争取生存以及采取利己行动<sup>①</sup>。从进化角度看,在大脑演化过程中,情绪引起的生理躯体机制比人类高级思维机制形成得更早。作为进化遗产的一部分,情绪在与认知和思考的互动过程中,引导我们的行为朝向生存以及繁衍的目标。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沃尔·坎农(Walter B.Cannon)对情绪与适应性的关系进行了许多阐释,而理查德·拉撒路(Richard Lazarus)和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等心理学家则描绘了情绪的进化起源与发展历程。尽管传统上情绪被认为是感性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典型现象,但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情绪的理性特质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如果情绪在功能上不能帮助人们作出有利的决策,那么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就会被退化。然而实际上,人类在演化过程中保留了比其他动物更复杂、精致和强大的情感能力,因此,人类情绪对人类决策行为的影响经过了进化过程的验证。当代心理学家认为,在任何有意识的分析之前,情绪和基于情绪的选择往往不可避免地会被唤起,这是其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被写入人类基因中的。

情绪作为进化过程中的适应机制也体现在生物神经科学中。尽管某些脑区与特定的情绪功能相关,但是,并没有某个脑区单独负责情绪。虽然杏仁核、伏核、海马、脑皮层上的前额叶眶回、前扣带回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这几个脑区与情绪功能密切相关<sup>②</sup>,但是说这些脑区构成了情绪却并不严谨,因为这些脑区还具有认知功能。事实上,海马、前额叶和顶叶区在认知加工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认知和情绪的功能和神经机制都存在交互作用。根据达马西奥的观点,推理和情绪实际上是依赖于相同神经系统的不同心理机制。也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推理的心理机制和情绪的作用机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生理基础也决定了完全独立的推理任务很难实现<sup>③</sup>。因此,情绪是在进化过程中作为一种适应机制作用于决策过程的。

那么,这种适应机制在决策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呢?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提出了躯体标志假说。躯体标志假说把情绪(情感)作为一种躯体标记,这种标志本质上是一种躯体神经反应,有时也包含着躯体记忆,既包括内脏感受也包括非内脏感受。其内在机制在于,感受到情绪体验时,躯体感觉皮质会进行记录产生躯体标记,躯体标记对情绪进行评价并长期保留在躯体中,躯体信号在遇到新的情境时就能够根据之前的情绪体验指导有机体的行动<sup>④</sup>。情绪作为身体上的感觉或意识,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由特定的思想或心理意象唤起的,当一个人开始思考一个决策的可能后果时,与某些后果相关的特定图像会触发直觉,而这种直觉会导致对选项的接受或拒绝。比如有些直觉“它迫使注意集中到某种行为选择可能导致的负面结果上,并且自动报警信号,提示你:当心前面的危险,如果你选择了这种反应方式就会导致这种负面后果”<sup>⑤</sup>,这种直觉帮助我们快速作出选择。但是躯体标记并不是决策的全部,它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推理计

<sup>①</sup>Robert Plutchik, “The Nature of Emotions: Human Emotions Have Deep Evolutionary Roots, a Fact that may Explain Their Complexity and Provide Tool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Scientist* 89, no. 4 (July-August 2001): 348.

<sup>②</sup>Luiz Pesso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Cognition,” *Nature Review Neuroscience* 9 (February 2008): 148-149.

<sup>③</sup>安东尼奥·R. 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毛彩凤译,第158页。

<sup>④</sup>费多益《认知视野中的情感依赖与理性、推理》,《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第37页。

<sup>⑤</sup>安东尼奥·R. 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毛彩凤译,第138页。

算,它的功能主要在于通过强调一些或危险或有益的选项,去除一些选项来帮助我们决策。显然在这种意义上,躯体标记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自动检测系统,或者说是一个偏好装置系统,有助于提高决策过程的准确性和效率。在生活中那些需要快速作出的决策,很多时候正是依靠这个自动检测系统本能地作出选择,可以说,这些决策是不经理性思考的过程而由情绪直接作出的。而且,躯体标记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的情绪体验不断修正和更新的。

情绪作为进化过程中的适应机制,揭示了环境对情绪的塑造以及人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发展出的适应性功能。

### (三)情绪作为一种功能的生成性机制作用于决策过程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情绪作为驱动机制和适应机制作用于决策过程,驱动机制强调了个体内在对外在环境的影响,而适应机制更注重外在环境通过情绪对个体内在的影响。这两种机制都对情绪在决策过程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而,情绪是一个开放、动态、多样化的复杂系统,要从还原论的角度探讨情绪的某一个作用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情绪作为一种驱动机制还是适应机制,它都是一种功能状态,就像我们的视觉、记忆、思维一样,具有身体的机能和意识的体验,并与我们的行动密切相关。在我们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我们综合运用认知、理性思维和情绪能力,很难将情绪功能与其他功能区分开来。如果我们用还原论的思想,仅仅看到某种具体功能是不能完整阐释情绪作用的。因此,我们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去反思和整合,而不是站在还原论角度分离出情绪的具体功能。情绪作为一种复杂而系统的能力,与人们的运动能力、知觉能力、思维能力、行动能力等相平行,又渗透到其他一切能力中,它不是其中任何一种能力,而又与所有其他能力相互作用,相互联结。因此,在决策范式中研究情绪的机制需要基于大脑、身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有机整体的研究。

情绪是一种功能状态,是通过动态的生成机制作用于决策过程。情绪是与外部世界进行着互动、实践的和发展变化的功能状态,它不仅受到内在认知、身体以及外界情境的影响,而且还反向影响着这些因素。它与我们的生活体验、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相互作用,并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不断实践和体验,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每个决策,这是一种生成性机制。

这种生成性机制可以解释描述性决策范式中的预期情绪,正是过往对环境的情绪体验生成了对环境的预期,从而引发失望、后悔等情绪。这种情绪反应模式构成了标准化决策范式中的“偏好”。生成性机制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也阐释了适应性决策范式所强调的适应性,并且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精神疾病,有时情绪是不适应的,情绪行为是某种“故障”,情绪障碍,如抑郁和焦虑,可能是这样的生成性故障,其本质在于情绪功能不能正常运行,没有生成适宜的反应,而是僵硬、固化,无法在与外部世界互动中发挥作用,甚至还起负面的阻碍作用,从而影响人的决策和生活。

## 四 结论

从三种决策范式中情绪的角色来看,情绪都隐性或显性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决策过程中,理性认知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标准决策范式过分强调理性计算和逻辑,只能解决知道如何做的问题,从决策的结果来看,不存在“绝对理性人”,也不存在最佳选择。“有限理性人”根据“满意”来评判决策的结果,而实际行动的发生,决定如何做和实际如何做是由情绪来决定的。在情绪作用于决策过程的运行机制中,仅强调情绪的驱动机制和适应机制还是不够的,只有把情绪看作一种功能,它在与我们的大脑、身体和环境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中,通过生成性机制作用于决策过程,才能真正做到知道如何做、决定如何做和实际如何做达到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哲学通过其独有的全面方法论及整体性的视角能够为情绪更好地发挥功能提供具体科学支持。

[责任编辑:何毅]